

《追光者》:

记录战地摄影师的抗战时刻

本报记者 张鹏禹



白求恩抢救伤员。
罗光达摄 (1939年)



革命圣地——延安。
徐肖冰摄 (1938年)

抗日战争时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穿梭在枪林弹雨中，以相机为“武器”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定格下中国军民奋起反抗的姿态。他们就是活跃在抗战前线和大后方的战地摄影师。近日，作家海飞的首部长篇非虚构作品《追光者》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该书深情描摹经历战火洗礼的雷烨、高帆、徐肖冰、罗光达、俞创硕等5位战地摄影师的英雄群像，带我们重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本报记者围绕新书写作对海飞进行了专访。

问: 大家对作为小说家和编剧的海飞比较熟悉，近期出版的《追光者》是一部非虚构作品。这次写作为何从虚构转向非虚构，有怎样的创作契机？

答: 2023年初，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陈云向我讲述了书中第一位男主角雷烨的故事。雷烨的人生很短，年仅29岁就牺牲了。他的经历以及他的亲人延续60年的寻亲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突然觉得，虚构和非虚构，核心都是讲好故事，这与我一直坚持的“故事海”理念不谋而合。我写过一些小说，大部分是关于地下斗争的。而这5位摄影师的人生，对我来说是讲好战争故事的又一新切口。

所以我想，在广阔的故事海洋里，是不是可以试着跨越类型和题材的藩篱，直抵交流和理解的中心。写作之初，我跟随几位摄影师的镜头看到了他们捕捉到的战争与历史记忆，更看到了人在极端环境下的挣扎、勇气与脆弱。这些感受，既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延安、北平、上海、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等一个个地理坐标之上，是5位战地记者、画报编辑的付出与牺牲。我也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将士、百姓等不同群体的行动。这些珍贵史实，是这本纪实作品建构之路上坚实的路基，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让宏大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也变得鲜活炽热。

问: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北平曾举办过一次规模宏大的“北平第一届摄影联合展览会”，策展人在前言中提到，“我们当国难严重的关头，所需要新的艺术，当然是以发扬民族精神为前提。”当时的摄影工作者，有很多都从追求诗情画意



和审美，转而投身抗日救亡宣传。是怎样的心理变化，促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日军的暴行和中国军民的反抗？

答: 这种转变既是当时中国摄影发展的必然，也有个人在时代潮流之下的主动选择，同时折射出抗日宣传的实效。摄影师沙飞明确提出“摄影武器论”，助力国防摄影从“暴露现实”这一目标更彻底地转向“宣传国难”，产生广泛影响。而他本人也直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解放区第一个以新闻记者身份投身革命的摄影工作者。在他的影响下，原本渴望上前线杀敌的罗光达，认识到革命摄影的重大意义，或许也意识到，这不仅是对战争的记录，实际也开辟了另一战场。而罗光达参与创办的晋察冀画报社，又带动了原本以木版画等手段宣传抗日的高帆等人。

另一方面，典卖祖屋前往延安、并自主购置相机的雷烨，以及上海早期“左翼电影人”徐肖冰，他们对抗战摄影的理解是更自发的。他们都在上海受到抗战文艺影响，早早意识到相机是一种武器，在抗大的学习中迅速成长起来。雷烨投身冀东，记录下日军在“千里无人区”惨无人道的犯罪事实，填补了摄影空白。徐肖冰上海时期的作品大多揭露底层苦难，抵达延安后参与建设延安电影团，与党的电影事业一同成长。

同样，从1932年开始周游中国、西画系出身的俞创硕，在两次长达万里的国难宣传之旅中，亲眼目睹了广袤国土上满布的战争伤痕，也见证了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的苦难景象。在此驱动下，他以记者身份穿梭于正面战场，多次出入战火中心。这一切行动的背后，既可见俞创硕纯粹而坚定的抗战初心，亦可见他深植心底的人道主义精神。

透过这几位摄影师，我们看到投身抗战的路径殊途同归，我相信，他们的经历也是当时摄影工作者的缩影。

问: 书中的5位摄影师令人印象深刻。雷烨在日寇扫荡时，为了给乡亲们送信错失转移时机，年仅29岁壮烈殉国；高帆16岁看到陕北公学招生启事后决心奔赴延安；徐肖冰冒着被日军轰炸的危险拍摄延安纪录片，记录下革命圣地的生活与斗争；罗光达背着枪和战士们驰骋

沙场，拍下白求恩救死扶伤的照片；俞创硕“抢救式”地拍战场，成为台儿庄战役打响后最靠近前线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在追寻战地摄影师革命足迹的过程中，如何看待他们秉持的价值观和摄影观？

答: 从摄影观来看，几位摄影师的经典作品背后，都倾注了职业性的热爱。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共性，那就是真实，真实的背后是勇气与悲悯。比如高帆在1948年的临汾战役中拍下我军爆破手进行连续爆破的场面，在多年后与亲人的聊天中，他仍在惦念这群无生还的爆破手。这张照片成为他们最后的存证，也见证了高帆在生死边缘按下快门的瞬间。这让我们看到，历史是由无数具体的人、具体的抉择、具体的牺牲连接而成的。

在民族存亡关头，他们与千千万万的战士们一样选择了舍身赴国难，以镜头为枪，成为历史有力的记录者。而且，他们几乎都与革命圣地延安有或深或浅的联系，这也是一种逆境中的“向光而行”。不论是雷烨“一直挺进在极度困难和艰苦的环境”，还是罗光达在得知白求恩死后的悲伤前行，这一段段朝向光、成为光的旅程，早已超越职业范畴，成为一种生命的态度和价值的锚点。

问: 书中提到，在太行山深处的华北战场，战地摄影师高帆在一间特殊的暗房忙碌工作，战场的紧张状态使他练就了快速配好显影液、定影液的本领。很多次，他就在老乡家把窗户用被子一遮，借两个大碗，装上显影液、定影液，冲底片、印照片。战地摄影师们当时的工作环境是怎样的？他们如何应对日军封锁造成摄影器材不足的问题？

答: 正如被闻一多称为“时代的鼓手”的诗人田间所言：“雷烨诗写得好，枪法也准，革命就需要这样的记者、诗人，文艺工作者本来就是一名战士，没有什么特殊……”这番话不仅是对雷烨的赞誉，更折射出那一代战地摄影师首先是战士的身份特点。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状态，也是战争时期特有的。

一是随军作战、深入火线。俞创硕镜头下重庆遭受空袭的惨烈、长沙大火的悲壮；徐肖冰镜头下的“百团大战”战斗实况；高帆对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长达十年的影像深耕——无

一不是血与火的见证，也无一不要求摄影师与军人具有同等程度的勇气与毅力。二是采写典型、揭露罪行。战地摄影师往往直面最残酷的现实，以镜头为历史作证。雷烨两赴潘家峪惨案现场，记录日军屠杀罪行，留下的照片成为民族苦难的视觉控诉。这类工作不仅极具危险，更需道德与意志的支撑。三是在机动中坚持生产。在“扫荡”与“反扫荡”的拉锯战中，他们常常一边制作报纸、画刊，一边紧急转移。罗光达等人就长期处于这种极不安定的工作环境中，编刊出报与行军作战几乎同步进行。四是记录军民互助、百姓面貌。在破碎山河之间，他们捕捉人的韧性，留存战火中互助前行的希望之光。徐肖冰镜头下，南泥湾从最初的“烂泥湾”到成为陕北的江南，让我们看到苦难中的希望。

在这些工作中，摄影材料和画报制作材料的稀缺是常态。当时一卷小小的胶卷，需要用金条来交换，还常常有价无市，运输过程更是充满危险。为将胶卷安全送至前线，他们需将胶卷层层包裹，藏入空油桶，再用小船从水路暗中运输，由武工队员冒险护送。此外，一旦遭遇日军“扫荡”，必须立即组织转移，工作人员常常不得不将珍贵的照片和未冲洗的胶卷紧急埋入大树下或野地里，以免落入敌手。这样的日子，他们坚持了多年。

问: 当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腰里挎着黑匣子，他为军民留影子，军民看了照片子，齐心抗日打鬼子。”你认为，战地摄影师对抗战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书中收录了哪些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照片？

答: 战地摄影师对抗战的贡献是无法量化的，通过他们的艰苦工作，战场与后方、苦难与牺牲、坚守与抵抗，得以被串联成一条清晰的动线，最终让一个时代的奉献与抗争，有了具体可感、震撼人心的视觉呈现。他们拍摄的许多照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俞创硕拍摄的一张名为《平型关大捷后归来》的照片，忠实记录了1937年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战士带着战利品凯旋的场景；1939年，罗光达镜头里的白求恩大夫为八路军伤员治病，定格下人道主义的大爱……他们无不用影像抵抗遗忘，用镜头传递信念。

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区域国别学作为国家战略与知识生产之间的交汇点，正逐步成为显学。因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既是知识生产的学术命题，更是服务国家战略的现实需求。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钱乘旦的新著《目标、路径与方法: 钱乘旦论区域国别研究与区域国别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以广阔的历史视野、鲜明的现实关怀与系统的理论建构，为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富有洞察力与实践价值的学术范本。

本书对“区域国别学”设置为一级学科进行了系统阐释与历史回顾。钱乘旦以学科论证亲历者的视角，回溯了从2018年北京大学建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到2022年该学科正式纳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的历程，揭示了学科建设背后的制度逻辑与知识机制。这不仅是一项教育制度的创新，更是对中国国家战略与知识体系构建之间互动逻辑的深刻洞察。钱乘旦认为，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需要。这一“从需求出发”的学科生长逻辑，打破了传统学术以“学理自足”为前提的范式，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学科设立的依据。区域国别学的设立，不是传统意义上知识内生逻辑的自然延展，而是国家导向下知识生产机制主动塑造的结果，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学术自主性的具体表现。

钱乘旦在书中多次强调，区域国别研究不能简单等同于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研究等，而是一个典型的交叉领域，需要多学科的知识支撑。其涉及的领域十分宽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民族、宗教等，它不属于现有任何一个学科。可见，区域国别学的本质是多学科知识的有机融合与跨学科方法的创新集成。在这一逻辑下，区域国别学改变了以往以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外国语文学等为依托的单一知识体系，倡导在具体国家和地区问题面前进行整体性、动态性与战略性研究。区域国别学不是传统学科之“拼盘”，而是一种高度融合后的新型知识形态，展现出跨越边界、突破边界、实行交叉的学科特点。可以说，钱乘旦在书中不仅是在回应为何设立一门新学科，更是在回应当代中国如何重新组织知识、建立国际认知体系这一重要问题。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贯穿全书的问题意识，而学科构建必然要求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体系与教学机制支撑。

对此，钱乘旦提出将“通才+专才”作为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方向，其中“通”是指对特定地区或国家应该有全面了解，不仅具备某专业的知识，而且应具有全面的知识；而“专”则强调针对某一地区或国家，在外交、法律、政治、公共卫生等特定领域具备深入洞察与专业研究能力。围绕这一培养目标，作者进一步指出，区域国别学的课程体系应涵盖“三外”，即国外历史、外国语、外国经历这三块基石，学科目标需落实在“知形”(宏观格局认知)、“知心”(人文心理把握)、“知行”(行动决策预判)三方面，并以“实用、实践、实证”为方法论。这种系统化、行动化的人才培养理念，拓展



了传统的学术训练框架，将“做中学、用中研”作为核心路径，鲜明地体现了区域国别学“以用促学”“以需定才”的现实属性。

“区域国别学是大国之学、实用之学，意思是说：大国需要这个学科，需要它为现实服务。”钱乘旦在书中这样写道。这不仅提炼了区域国别学的属性，也揭示了其对提升全民国际认知能力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区域国别学应服务国家战略制定、辅助外交决策，更要通过高质量的科普读物、主流媒体传播、公共教育等形式，向公众普及多元化、立体化的世界图景。书中提到的“再看世界”等知识平台，正是区域国别学实现“从精英认知到大众认知”的有益尝试。这种面向公众的知识生产路径，既是对学术话语大众化的探索，也是对“学术共同体—国家战略—社会公众”三者关系的重新思考。

《目标、路径与方法》既是对学科设置历程的真实记录与回顾，更是一份凝练的学科方法论纲领，体现了作者作为学科主要推动者的理论思考与现实关怀。作者在书中系统回应了“区域国别学是什么、为何设立、如何建设、何以重要”等命题，附录囊括学科设立的多份一手资料。对于青年学者，亦或是对于正在筹建或完善该学科的高校科研院所而言，这些内容勾勒出一幅“思想地图”与“行动指南”。该书不仅是一本值得研读的学术著作，更是一份激励青年学者投身新时代知识体系重塑、积极服务国家发展的学术召唤。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

《泰兴号》英文版: 向世界讲述海上丝路故事

本报电 (徐妍迪) 近日，长篇小说《泰兴号》英文版 The Porcelain Maker's Daughter (《瓷窑主的女儿》) 由 eBookPro 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在全球电商平台亚马逊上线销售。

《泰兴号》由作家协会会员于强创作，汪桂平将其翻译为英文。《泰兴号》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蓝本，艺术再现了1822年清代商船“泰兴号”在西方世界具有广泛知名度。1999年，该沉船被发现并从中打捞出超过35万件德化瓷器，成为国际水下考古史上规模最大的瓷器发掘项目之一。

带读者领略希腊饮食文化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近日，《从祖母厨房到世界餐桌》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举办，希腊驻华大使埃夫尼奥斯·卡尔佩里斯等参加活动。

《从祖母厨房到世界餐桌》由徐莉撰写，中译出版社出版。作者凭借其独特的跨文化视角，以细腻朴实的笔触，将中希家庭的脉脉温情与中希文化交融之美凝于笔端，通过数十个来自希腊本土的祖传菜肴，带读者领略独特、质朴的希腊美食文化，传达

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讲述了瓷窑主女儿成雅芳与何祖耀如何突破重重困难、历尽千难万险终成眷侣的故事，穿插描绘了船难中各类人物的命运抉择与情感坚守，呈现了灾难中的人性光辉。

据了解，“泰兴号”(The Tek Sing)在西方世界具有广泛知名度。1999年，该沉船被发现并从中打捞出超过35万件德化瓷器，成为国际水下考古史上规模最大的瓷器发掘项目之一。

积极、豁达的价值观。

作者徐莉表示，美食为媒，人与人之间分享与传递的不只是希腊小吃，也是信息与温情。几代人传承下来的不只是菜肴与菜谱，更有文化与历史。

近年来，中译出版社推出《美的多元: 古希腊的艺术与生活》《希腊神话全书 (全6册)》《电梯里的古希腊》《探寻希腊人》《跨文化传播: 赫拉克勒斯神话品析》等希腊主题图书，持续推动中希文化交流。

以知识人为镜反思战争

——读王升远《妥协与对抗: 日本知识人的战时与战败》

董 悅

狂热里，默默翻译着法国人文主义者的经典作品，在艰难时局中保持精神上的独立。然而，这类保持距离与批判姿态的知识人终归只是少数。与荷风们的抵抗形成对照，更多的知识人在面对生活困顿、举国狂热的现实状况时最终选择了协同。

普遍的失责与事后的矫饰，使作者发出警示，必须对“反战”(即反对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内涵加以辨析。将一切笼统归于“反战”，往往模糊了判断，甚至可能掩盖历史真相。在这种辨析中，作者也将视角延伸至以“反战”导演著称的战后一代宫崎骏的动画作品，分析其艺术表达所承载的政治关切。如果说《红猪》中的波鲁克以“拒

绝战争逻辑”的姿态，宣示了一种反法西斯的个人立场；那么《哈尔的移动城堡》则展现了在战争谎言中，个体为守护人性所作出的选择。由此观之，若仅抽象地谈论“反战”而不辨析“谁”在“为了什么”而去“反对什么”，就难以理性、冷静地审视那段复杂且非缠绕的历史。这些作品虽出自战后一代，却依旧回应着“为何反战、如何反战”的时代追问，为当代的战争反思提供了具体的经验证据。

作者提示我们，真正使“反战”话语具备生命力的并非抽象的口号，而是具体的生命体验。书中引用加藤阳子的反思颇具启发性，当学界热衷于构建“井井有条的反战逻辑”时，却忽视了战时普通人的“不惜撒